

史学蠡测

李大钊与辛亥革命运动

李大钊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思想家。他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早期中国共运的事迹，人多熟知。但他与前此的辛亥革命运动的关系知者甚少。40年代末期写的《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一文，曾说李大钊“原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国民党员”。^①这是惟一言及李氏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著述。虽则此话说得笼统，兼且有可商榷的地方，对这种说法，迄今几十年来，国内外研究李大钊的著作一直置之不理，未加探究，甚至加以否定。^②笔者分别在拙著《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以及用日文发表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反传统思想——兼论五四运动的源流》一文中，一再指出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时代，曾参与革命秘密组织，并与身辛亥革命的起义工作。^③由于为内容和体例所囿，拙著中对李大钊这段革命活动的史迹并未有作具体而详细的考释。鉴于近日海内外学界对李大钊的研究日盛，一些著述亦开始关注到辛亥革命运动对李氏产生了影响的问题。可惜仅此而已，并未见有新的进展。^④故此不惜仓促草成此文，根据有限的材料去考释李大钊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以期抛砖引玉，引起研究工作者的注意，着手进行调查和研究李大钊在辛亥时代的革命活动，为李氏

一生的革命事迹补上这段空白。

辛亥革命天津的重要领导人凌铎撰写的《滦州起义》是至今能见到惟一记载了李大钊与辛亥革命运动的一手史料。据他记述当时北方革命的发展情形说：

科举一停，学校大兴，北京为政治中心，津、保遍迹、畿辅人文荟萃，闻见较广，故青年志士，不惜清家破产，不辞跋山涉水，远道麇集，盛极一时。惟其来之远也，故不乏英俊之士，以其来之众也，故不乏爱国之流，以当日国事之非，强邻之逼人，于英俊爱国之耳目激荡其神经，安能不怒发冲冠，拔剑挺起，以泄其悲歌慷慨之怀，会安重根刺伊藤博文于哈尔滨，日本复侵占我间岛，青年之血，壮士之气，更有不能隐忍之势。是时北洋学校，以天津为最盛，天津学校又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人才为最多，思想最发达，而北洋法政专门中，如凌铎、李大钊、胡宪、张良坤等富于国家思想，革命志愿〔，〕早与革命同志秘密结合，默查当日士气愤慨，遂以间岛问题招叙各校同学开扩大会议，公决推温世霖、凌铎、胡宪等代表，要求实行改革。^⑤

以上一段文字，时间上虽则不大明确，但对天津学界在清末的革命思想和活动的发展经过的叙述，却相当清楚。首先我们了解到自废科举后（1905年）的二三年间，学界革命思想渐浓厚。李大钊是在1907年入北洋法政学校的，那时显然已怀有救国的革命思想。李大钊的《狱中自述》说过“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一语可印证。^⑥且早与凌铎等人秘密结合。至于他们秘密结合在何时？凌文没有确实的说明。若据文中说是在朝鲜志士安重根刺伊藤博文于哈尔滨（1909年10月）一事后

的话，则李、凌等具有革命倾向的同学之秘密结合起来，或在 1909 年末。待间岛事件发生，且发动扩大会议，则秘密组织当在间岛事件（1910 年）之前。当时即使在天津法政学校还有其他的革命组织如“克复学会”等。^⑦所以李大钊与凌铎等在 1909 年组织了革命团体是可信的。他们又乘间岛事件发起扩大会议，举行罢课运动，要求清廷开国会。然而此运动因清廷的压制而受挫折。

经此挫折，加上在天津宣传革命的胡瑛为张之洞囚于狱中，促使他们走上更积极的革命活动。据凌铎说：

革命同志久已愤恨，又经此挫折，势非团结前进不能立足，由凌铎、王法勤、李大钊、胡宪等密约至日租界荣华里开会，公决实行严密组织，广求同志。又以同盟会易引起敌探的注意，特取避人耳目之手段组织北方共和会，总机关密设于法租界梨栈生昌酒店。……白雅雨闻风加入后，更介绍其弟子北洋高等女师范学生张星华等十余人，暗募会费，密运军火，宣传主义，探听敌情，京、津保各重地，盖无往而不潜伏北方共和会之实力也。^⑧

照上文的文义，可见凌、李等人约在 1910 年，至少是辛亥起事前已组织了革命团体“共和会”^⑨

1911 年春，清政府决定秋季在永平（滦州附近）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时驻奉天等地的新军准备在 10 月开赴滦州待命。革命党人得到消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策动在滦州待命的新军届时起义。正好这个时候，武昌起义成功，清廷下令取消演习，命新军返回原地。时张绍曾拒命，被袁世凯下令剥夺军权，吴禄贞被暗杀，蓝天蔚被迫离去，新军起义计划遭受挫折。有见于此，

白雅雨、凌铨等遂召开共和会大会，组织敢死队，时签名者逾七十人，推凌为队长，并组织队员十八人分组到滦州，鼓励该地驻军起义。^⑩他们联络了新军第廿镇中下级军官王金铭、施从云等人。1912年1月1日，南京组织了临时政府，孙中山被选为临时总统，滦州军遂在1月3日成立军政府，王金铭任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白雅雨为参谋长，凌铨为敢死队队长兼外交部长。次日誓师，宣布独立。但通（州）永（平）镇总兵王怀庆叛变，由唐山附近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有见于此，遂离滦西行，计划先取天津，再攻北京，然而张建功叛变，拒不开拔，封锁滦州，并向王怀庆通报军情。起义军遂突围，到了雷庄，被王怀庆的援兵曹錕军包围，革命军败，白雅雨、施从云等人牺牲。

天津地区的起义，实是由同盟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共和会等革命团体组成的北方革命协会的共同行动。^⑪所以当事人在日后回忆其时的内情、经过与人物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但天津共和会对滦州起义运动用力最多，而且大部分优秀分子参加了这个运动^⑫，雷庄的失败，令白雅雨等壮烈牺牲，敢死队中人余皆不知下落。面对这种局面，凌铨描述共和会会员当时的状况说：

如马浩、汪瀛、李大钊……等数十余人，或愤恨而悲痛失声，或疾首痛心而莫知所措，或搔首问天愤不欲生，或疑信参半化装亲至唐山、开平、大冶等地密探真象，悲歌慷慨，惨极一时。^⑬

由以上的叙述，得见李大钊与共和党人一同参加了辛亥年的起义工作，至于是否敢死队队员，因无确据，不敢妄下论断。

到南北议和，共和党人极力阻止，由于大势所趋，让袁事成。共和党很多会员以此局面是“私相授受”，而“抱失策之恨”。故此与袁世凯等军阀势力，一直势不两立。所以自袁世凯统治民国以来，共和党人一直受到压制和毒害，加上后继的主持人领导乏力，而渐溃散。

凌文是记述李大钊与辛亥革命关系的惟一的一手史料，其真实性可由李氏一些文章获得佐证。

首先，1917年6月25日李大钊在《甲寅月刊》曾撰文，报道他母校的近况。其中说：

清季天津学生之与请开国会运动，革命运动者以斯校徒为最激烈。卒以是为官僚所疾视，屡谋所以破坏而未遂。武昌起义时袁世凯由河南向武汉出发之前，即电天津总督谓宜注意防范斯校，其生徒精神之活泼有如此者。民国成立后，以改革之业告成，乃潜心读书，不与闻外事，而斯校亦渐缩小，另名为直隶法政专门学校，非复曩者之盛矣！^⑭

另外，李大钊对辛亥年为起义而牺牲的志士，日后一再为文悼念。首先在1917年的《旅行日记》上说：

天将破晓，过雷庄，猛忆此为滦州革命失败之地，白亚雨、王金铭、施从云二队官及其他诸烈士，均于此地就义焉。……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⑮

又在《五峰游记》一文上说：

到滦州车站……有一标在此起义，众不敌失败，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参谋长白亚雨等殉难，这是历史上的纪念地。^①

将李大钊以上的文字，再参照上文所述，见到他对天津革命的内情和经过相当了解；对殉难烈士一再为文悼念，情深一往。这都不难体会，这是过来人语，知内情人语。

最后还有一点要申述的。首先，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时代曾发起革命秘密团体，并与身辛亥革命起义的工作，应确有其事。但关于天津共和会，甚至在东北的其他小革命团体之与同盟会的关系，各人记载不同，众说纷纭。这是研究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课题。天津共和会中人很多是同盟会员，但亦不见得所有共和会人都是同盟会员。所以李大钊是否属同盟会的会员，正反两面证据，皆付之阙如。^②不过华应申一书中说李大钊是“国民党员”则无资料可凭。进入民国，李大钊 1913 年在北京曾与社会党领导人陈翼龙认识，经介绍入社会党，后并担任天津社会党总干事。^③反而不见有与国民党有联系的线索。

其次，李大钊在民国初建，至袁世凯覆灭，对袁氏称帝以及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等反动行为，一贯强烈反对。无论在国内在日本，无论在言论和行动上，都积极参与反袁的革命工作，这是较为人所知的。这种态度与李大钊辛亥革命时代，在天津的革命过程中，对以袁世凯为首等北洋军阀的本质，及早有较真切的体认不无关系。

注释：

①载华应申编：《中国共产党烈士传》，新民主出版社（香港）1949 年版，第

2 页。

② 如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p. 11 (New York: Atheneun. 1970) 等。

③ 《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7 页；《辛亥革命时期的反传统思想——兼论五四运动的源流》，载日本广岛史学会编：《史学研究》146 号，1979 年 12 月。

④ 如《李大钊传》编写组编：《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罗宝轩、张莹：《革命先烈李大钊》，载《历史教学》月刊，1979 年第三期，总 183 期等。

⑤ 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1962 年版（台北）。

⑥ 黄真、朱乔森：《李大钊烈士生平活动年表》，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北京出版社 1979 年版。

⑦ 于树德：《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425 页。

⑧ 同注⑤。

⑨ 但很多当事人却谓共和会组织于武昌起义之后，并谓组织人是白雅雨。（见于树德前引文，第 246、429 页。）但综合其他诸人的回忆，共和会的组成应在武昌起义前。（见南琴轩：《辛亥滦州起义》，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第 299 页；乙巳俱乐部：《辛亥滦州光复史概要》，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第 302 页。）

⑩ 关于敢死队人数也有不同说法，有谓十八人（见前南琴轩和乙巳俱乐部两文）；有谓十四人（见于树德前引文，第 426 页）；有称民兵为二十余人（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 409 页）。

⑪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第 200 页。

⑫ 参看凌铨：《滦州起义》、于树德：《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二文。

⑬ 凌铨：《滦州起义》，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第 285 页。

⑭ 刘桢：《李大钊同志的一篇佚文》，载《教学与研究》，1980 年第四期。

⑮ 原载《甲寅月刊》101 号，今转引自陈有清：《李大钊的老师白毓昆烈士》，载《革命文物》（双月刊），1980 年第四期。

⑯ 原载《新生活》，1919 年第二期，今转引自上引的《李大钊传》，第 9 页。

⑰ 乙巳俱乐部：《辛亥滦州光复概要》，载《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第 302 页；刘清杨：《辛亥革命时期的天津共和会》，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67 页。

⑱ 顾颉刚、曹绶之、曹嘉荫：《中国社会党和陈翼龙的死》，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 503 页。

（原载（开卷）[香港] 1980 年 12 月号）

孙中山与五四知识分子

1924 年初，改组中国国民党并推行国共合作的政策，应是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发展。孙中山革命事业这种巨大发展的促成，与其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转变攸关，自不待言。其中，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日益高涨的知识青年的爱国运动，及革命思潮的澎湃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影响，至为明显和重大。

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以及该运动之对孙中山的具体影响，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并取得很好的成果。^① 本论文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专就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之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和积极从事救国运动的知识青年之间的关系和演变的过程，作些整理和疏解的工作，希望有助于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历史的认识。

—

1919 年 5 月 4 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乃孕育于前之几年发轫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则经“五四运动”而得“波涛汹涌，弥漫全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和指导者，主要是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所结集起来的知识分子为主；“五四运动”的发端，乃始于以北京大学等专上学校为首的青年学生，这

都是共识的历史事实。到了五四前后，无论是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抑或是推动救国运动的青年学生，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和势力中，隐然勃兴成一股新的革新力量，为以后的国民革命奠定了基础。

过往，关于孙中山及当时的国民党之与推动五四新文化和救国运动的新兴革新力量的关系，颇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以罗家伦和黄季陆等人所代表的看法，颇强调了运动及其推动力量之与孙中山的关系，^②不少史家也颇承其说。^③其中黄季陆的看法最能概括这种观点。他认为：

五四运动的成因，实导源于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发展与继续。这是一个争议不息的问题，不得不加以剖析。要对这一个问题有充分的了解，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北京大学和他本人的历史，他与中国革命及其与中山先生个人间的关系的明白，是十分重要的。^④

他以蔡元培在考虑接受当时北京政府的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时，在上海曾遭受部分旧日同志的反对。相对于此，孙中山对蔡元培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却予以赞成的这件事，遂谓“证明中山先生真有眼光和风度。使蔡元培把革命的精神传播到北京去。若再加以蔡先生新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与孙中山函件的交往，更知孙中山所依赖于蔡先生的地方，是早有安排和打算的。黄氏进一步说：

蔡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工作，是革命党隐伏在北方文化教育方面的一着棋。民国八年（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如果说北京大学是当时思想策动的中心，那末其中心人物无

疑也就是蔡元培先生。五四运动的真实意义是国民革命的发展和继续，是固蔽的思想、文化的突破，亦即是另一种形式的首都革命。把当日旧势力集中的北京沉闷的局势翻造过来，影响及全国，使国民革命获得蓬勃便利的发展。当然，隐伏在北方的革命棋子不止蔡先生一人，其他的人和其他的因素很多，蔡先生不过是一显著的代表者。……据我所知蔡先生在北大期间所聘请的教授中尚有陈独秀、石瑛、王雪艇、张颐、贺子才、马叙伦、朱家骅、李石曾、吴稚晖诸先生，都是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同盟会会员。他们各自到校的时间虽无暇考证。但他们当中有的是新文化运动文学运动及影响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前在北京主持对军阀斗争的领导人物。^⑤

归结上述所说，黄季陆之强调孙中山之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其根据是由于蔡元培等人的与同盟会的关系。这种根据不仅迂曲笼统，且词多臆测，缺具体资料的证明。

辛亥革命时期，蔡元培是孙中山的重要革命同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中，蔡元培也担当了“护法”的角色，这都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层关系并不能证明孙中山领导和影响了五四运动，其理也甚明。何况，由现今资料所见，蔡元培之到北京大学，并非出于孙中山和当时的国民党作为革命策略的着意安排。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校长后之与孙中山的来往书信，所道及的都是无关乎现实政治的其他事情。^⑥五四时代的蔡元培毋宁说是有意摆脱现实的政治，而专志于文化思想和教育工作上去。甚至可以说，其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国民党人是与孙中山的关系最是疏离的一段时期。^⑦1917年3月15日，蔡氏履任北大校长不久，给汪精卫一函中就明白表示说：

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外国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之任之者，亦在此。……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示不涉政界之决心。^④

印证这段时期蔡元培的思想和行动，他所说“不涉政界之决心”的思想态度是真实的。蔡元培的这种要摆脱现实政治活动，而从文化教育入手去改造当时中国的愿望是五四运动前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共通思想和态度。

上引黄季陆列举蔡元培出掌北大所聘用的教授中属同盟会会员者，如陈独秀等并非同盟会会员，石瑛、贺子才等确是同盟会会员，然而在五四运动中无甚表现，不大活跃。除此而外，时任教于北大而属同盟会籍尚大有人在，如黄季刚、黄晦闻等，他们在五四运动并不活跃，甚至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

当然，如果作历史性的分析，五四运动的发生，曾受过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或谓蔡元培等原辛亥革命党人在北大推动新思潮运动，客观上为以后的政治形势的发展起了作用，都是无可置疑的。这样的历史性的分析跟具体地说五四运动来自孙中山的领导和影响，层次不同。

相对于黄季陆和罗家伦等人的观点，关于孙中山之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另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长期以来，与国共两方面的政治人物有过密切的来往，而且谙于近代政治掌故的曹聚仁认为：

其实领导五四运动的文化人，并没有一个是属于国民党

的，而且，孙中山本人就主张保持旧文体，不十分赞成白话文的，他也在提倡什么旧道德，和新青年派的反封建观点是相反的。站在新文化的激进线上，研究梁启超派所创办的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其在文化上所尽的人力，远在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之上。至于共产党的成立，那是后来的事。那时的陈独秀乃是属于新青年社，并不曾参加社会主义团体。五四运动乃是一群知识青年觉悟了以后的集团行动，几乎和任何团体没有直接关系的。^⑨

曹氏这一段话，虽不都妥帖，不过有两点看法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他认为孙中山和当时的国民党与五四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五四运动是一群觉悟后的知识青年的集团行动，与当时现存的政治团体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个看法颇合乎历史事实的。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橘朴的“作为中国民族运动的五四运动的思想背景”一文也认为：在民国后特别是1917年，青年学生已成为改革的中心力量。当时作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指导和赞助者，最具影响力的，首先是北京大学一派，其次是孙中山一派。文中橘朴进一步说，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一派因受袁世凯为中心的军阀势力的压制，到1916年在中国思想界无多大的改进，反而同年末的文学革命却勃兴起来，直到1923年，北京大学一派却成为青年学生最大的指导势力，云云。^⑩

曹聚仁和橘朴的看法，虽无在资料上作出详细的佐证，但确实能道出五四前后思想界的变化。其时，青年学生已成为一股新的革新力量，而新青年和北大的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势力也有别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政治势力。

20年代初期，在中国政治运动中曾起过举足轻重的地位的

苏联驻中国代表马林，也有与曹聚仁和橘朴接近的看法。他在 1923 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国民党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中，道：

当爱国精神表现的时候，当国民革命发达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辛亥革命的国民党。例如：民国八年（1919 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1915 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很可以举许多例来指出国民党在学生会、商会和别种团体对列强屈辱中国做示威运动的时候，没有能在其中指导和促进。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的名字也没有提起。国民党所以不能得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不是没有理由的。^①

马林的看法应是基于一种观察，相当反映了当时的实在。总的来说，1917 年起学生的爱国运动渐趋活跃而且形成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以北大和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寝然成为青年运动的指导力量。相对于此，孙中山和当时仍算是中国政治主导势力的国民党，在五四期间特别是 1919 年以前，对这股新兴的革新力量不仅不能作有效的指导，甚至呈现了疏离的现象。

二

由现有资料所见，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力量，在五四运动前，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政治势力

关系不大。反而，一种要求摆脱和超越包括当时的国民党在内的既存的政治势力的言论，五四运动前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文章中，屡有所见。譬如，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同时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的陈独秀，在所撰“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即揭示要“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他认为“政党政治，将随 1915 年为过去之长物，业不适用于今日中国也”。^⑫ 另在“答汪叔潜（政党政治）”一公开信中，陈氏强调要区别政党政治和国民政治，表明《新青年》所从事的是求国民觉悟的国民政治。甚至在 1919 年 12 月 1 日“本志宣言”中，陈氏仍强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运动，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⑬ 胡适日后屡屡提及，说当时《新青年》杂志同人有“20 年不谈政治之理想”的一番话，是为人所熟悉的。^⑭ 如果我们不怀疑胡适这番话的真实性，又将这句话理解为不具体谈现实政治和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话，这句话确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五四前期的态度。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的扩大，以北大和《新青年》所集结起来的一群隐然成为进步青年最有力的指导力量，也因此在他们间逐渐形成了相当浓厚的自成势力集团意识。1919 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充分体现了这个指导势力的影响力，不过经此运动也促成了这个指导势力的明显分化。^⑮ 即使在公开分化的五四后期，他们的自成势力的集团意识仍旧存在。1922 年初，距全力协助孙中山推动国民党的改组为时不远，且因《问题与主义》而公开论争的时候，李大钊曾给胡适一封信，内中说到：

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如国民党系看见这些系的垂涎，便不免起点醋意，真正

讨厌。^⑮

这种以北大为中心，自别于各党派甚至包括了国民党在内的派别思想，不难在这封信中充分反映出来。

国民党与五四运动关系不大，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倡导者沈尹默曾有过一段论述：

当时国民党方面只有孙中山先生重视这一运动，能利用它革新了自己的思想，订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关系后来的革命是很大的。其外的党人们，则不见受到多大的影响，甚至有些元老们如戴季陶等还有点漠视这个运动，因而嫉视到北大，并且非难到蔡子民先生，这是要争革命首功的心理所造成的思想，那便不足道了。^⑰

所论虽指的是五四运动后的事，这也反映了国民党与五四运动之间的疏离情况。五四运动后国民党中除了孙中山外，廖仲恺、朱执信和邵力子等人也注重五四运动且深受影响。不过，其中确以孙中山最具关键性。

细加考核，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一定是同盟会会员或国民党党员，不过值得注意的，他们在清末民初期间，大都是曾与身革命运动或站在革命的立场的。其中蔡元培不用说，至于陈独秀、鲁迅、潘赞化、陈大齐、沈尹默和钱玄同等，都是辛亥革命时期江浙地区的资深党人。比以上诸人为年轻的一辈如刘叔雅、李大钊、易白沙、高语罕、高一涵、刘半农、李辛白等也是辛亥革命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另外如陶履恭、朱希祖、杨昌济、沈兼士、周作人甚至胡适之在清末民初，立场是倾向革命派这一边的。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原属辛亥革命运动中人。^⑧

这个原属辛亥革命运动革命党人的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力量，五四前后之所以自别和疏离在当时仍代表革命实力派和主流派的国民党的缘由，革命派系的分歧、文化修养和教育背景的不同、地域性的人际关系的影响，都是部分的理由。然而经二次革命的挫败，国民党或中华革命党仍一如过往，专注于上层的政治活动和诉之于军事行动，在革命思想和方法未见有改弦更张的情况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却代表了思想界的新趋势，他们在如何挽救和改造中国在思想和方法上都有进一步的认识，这应是他们与国民党势力疏离的最重要的理由。当然民国成立后，国民党的腐败也足令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感到失望而加以离弃。这种事实，其时的国民党重要干部于右任就曾慨然分析过，说：

中国政治界之黑暗，亦可谓极矣。爱国之政治家必须相互结合以自厚其势力，庶可以与此黑暗势力相搏斗，国民党即从事于此等搏斗之一种结合也。国民党之搏斗，十余年未有奏效，考察其故，以为有二：一，国民党本身之须刷新也。国民党自以同盟会完成辛亥革命之功，旧时同志既不免偶染官僚恶习，而民国初立，入党之分子更不免有复杂冒滥；中间经二次革命之顿挫，党员穷困，亦多失其所宗。故其与党也，遂不免貌合神离，为后诟病。……二，有力同志之未尽加入国民党也。民国自被袁氏蹂躏，一般学人颇致疑于政治活动之未足以救国，及后稍有觉悟，又多泛滥于高远无着落之各派社会主义。近两三年，始渐闻有认定应为政治活动之社会党（即陈独秀君所组织），然此等社会党对于国民党们不免若即若离。^⑨